文学批评有效性减弱乃至“失效”了吗

文坛观察 WENTANGUANCHA

□桫 椤

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生态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学批评不仅保证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以及当前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建构，也都发挥了基础性的重大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文学批评应更好地为新时代文学发展保驾护航。然而，当下的文学批评却不断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其中引起广泛讨论的是文学批评有效性减弱乃至“失效”的问题。

当前，文学批评有效性减弱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引导创作层面，文学批评对作品或者作家的评价，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作家对创作和作品的认识？对于文学现场中出现的趋势性、潮流性现象，文学批评发挥了哪些引导作用？或许批评家可以为自己的无效工作辩解，认为批评家并不搞创作，只需要按照批评的路径去评论，说的话有用没用，作家采纳不采纳，都与自己无关。批评与创作自说自话，缺乏有效交流和沟通；或者批评家一味吹捧作家，这样的“内卷化”行为对评论和创作都产生了消极影响。文学批评对文学没有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比如，创作中的审美范式问题，一些作家用西方的表达方式表现中国人的情感，很多作品被读者误以为是翻译作品，这样的写法很难被大众读者接受；再如，网络文学中一些不合逻辑、有失文学基本规范，或者违背基本伦理道德的书写屡禁不止，评论界却没有旗帜鲜明的态度和立场。批评家成为创作的旁观者或者附庸，是对评论价值的矮化与歪曲。

二是在对读者的引导上，文学批评对大众审美的提升是失效的。文学批评不专注于对作品、作家和现象的评论，而热衷于知识生产。很多评论文章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学术发现或发明，这种发现和发明对读者理解作品和认识文学现场有没有用，作者不去管。这种趋势显示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之间的界限被混淆了，批评家变成了理论家，从文学现场寻找学理性研究的材料，而对作家作品和潮流缺乏有立场、有姿态、敢亮出好或不好态度的评论意见，读者不能从中获得有建设性和指导性的意见。这等于批评家放弃了文学批评的话语权。有学者指出，当历史学家哀叹大众的历史知识匮乏、观念陈旧的时候，应该扪心自问：自己的研究有多少提高了民众的历史水平？这个观点对文学评论也同样适用。

文学批评有效性减弱的一个可见的原因，是受到了批评风格的局限。在评论、学术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大量使用理论工具拆解作品，通过各种佶屈聱牙的概念和纯学术化的逻辑来完成文章的论证，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无法看明白。笔者十分推崇已故文学理论家童庆炳教授的文风，他笔下哪怕是那些进行文学研究的理论文章，也有着质朴的风格，绝不掉书袋。当下的批评文章仿佛出发点不是让人看懂，而是显示作者自己有学问，这种评论风格使文学批评呈现出严重的内循环现象，除了相关研究方向的圈内人，大众是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读的。这显然影响了评论文章和观点面向大众的传播，没有使文学批评的效益最大化。

文学评论增强有效性，需要评论家走出书本，回到时代生活的现场，把批评放在生活中加以观察和思考。好的文学批评，不应该是从理论到理论，而应当立足于对读者的精神生活发生作用。我们倡导作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评论家也需要这样做。一个不了解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批评家，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好文章的，因为他无法正确和全面理解所阅读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还要回到文学中来评价文学，而不是进入理论中研究文学，文学批评要面对文学创作和传播、接受的现场，面对并朝向文本和作家说话，而不能把阅读文学文本当作某个既定的理论观点寻找证据。文学批评的创新性观点是从文学现场得来的，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而不应该反过来。文学批评要回到人民中来，要面对大多数人说话，而不能只写给内行人和行内人；文学批评要有志于向大众表达自己所坚守的价值和意义，这样才能逐步提升全社会的审美素养和文明程度。

文学批评增强有效性，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要重视媒介革命对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的影响。我们要认识到，网络不只是一种传播工具，它提供的是一种时代生活的现场，是一种思考、言说的环境和语境。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论断告诉我们，媒介不只是用来传播信息的，这种媒介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它的传播方式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网络文学的出现，正是因为人们获取信息和获得精神抚慰的方式变了，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文学样式必然要发生改变。文学中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鄙视链”，网络文学处在最底端，传统文学看不起网络文学。但是，真正进入到网络文艺现场就会发现，网络文学实际上是网络文艺中的“精英”，网络短视频、网络综艺和网络直播等网络文艺生态已经形成，而且每一种网络文艺的形式都比传统文学读者多得多。纯文学的小众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因此，文学批评有责任在媒介革命的洪流中，帮助纯文学“出圈”和“跨圈”，以新的面孔回到大众的视野中，被读者重新“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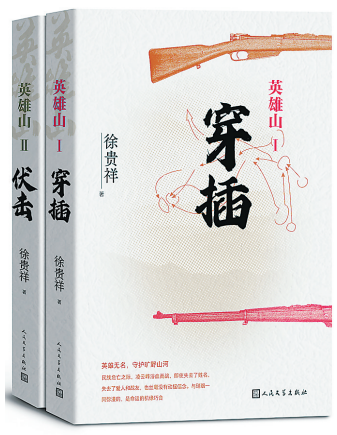
谱写壮阔的革命历史传奇 ——评徐贵祥长篇小说《英雄山》

□孔立文

军旅作家徐贵祥多年来深耕战争历史题材，对于个体生命与战争历史、日常经验与极端经验的体悟和书写都极具个性和深度。他的最新长篇小说《英雄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分为《穿插》《伏击》上下两部，各自成书，前后呼应，互为补充，从“一正一反”“一明一暗”两个英雄人物的视角，谱写出壮阔的革命历史传奇。

追根溯源，探求英雄出处。尘世间没有天生的英雄，英雄的养成是渐进式的。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作家没有止于英雄叙事，而是用细腻的笔触，以接地气的方式，艺术再现了英雄的成长路径。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可以称为凌云峰，只不过《穿插》中是真凌云峰，《伏击》中是假凌云峰。真假凌云峰阴差阳错角色变换，这本身就是难得的戏剧性反转，从另一侧面印证英雄养成的复杂与真实。在人物细节刻画上，作家着力关注个体价值判断的多样性，特别关照人物内心的悸动与波澜，在历史视野之下努力探寻英雄人物的成长轨迹。英雄是鲜活的个体的人，既有七情六欲，也有爱恨情愁。比如易晓岚，这个人最初没什么觉悟，甚至有些反动，他内心纠结、挣扎，思想不断反复，而这恰恰符合人物的个性特征。他不懂政治，但在西路军归队人员学习班培训期间，以及在之后遂行作战任务中，他在思想上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净化和洗礼。易晓岚一次次把自己当成凌云峰，在内心深处不断地实现真正的角色转换。

拨云见日，挖掘力量源泉。在《英雄山》中，真假凌云峰披荆斩棘、无畏生死的英雄壮举，悲壮激昂，撼动人心。为什么真的凌云峰身困国民党阵营仍信念如钢？是什么使易晓岚从一个潜伏于共产党队伍中的国民党特务，最终成长为共产党员，成为与真的凌云峰真假难辨的“穿插英雄”？那是信仰的力量。英雄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信仰与责任铸就的坚强意志。真假凌云峰两位主人公，最终选择的都是为人民谋幸福。民心所向，才是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正如小说中凌云峰所说：“我们穿马克思鞋，走革命路，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再贫穷，让更多的人不穿草鞋。”这一崇高信仰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就是一面镜子，警示我们要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忠诚履行职责，勇于担当作为。



回望历史，找寻革命初心。作者以文学的方式找寻共产党人的初心，这不仅是为了认识和铭记这段历史，更是一种警醒和反思。我们党已经走过近百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曾经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一部作品分作两部来写，《英雄山》无疑具有突破性的叙事价值。两部作品一个主题，两个叙事者均采用第一人称，最后又皆转为全知全能的灵魂叙事。多重视角之下，整个故事虽然迷雾重重，谍影丛生，但却立体多面，震撼人心。小说中众多人物关系相互勾连，爱恨情愁交织缠绕，真假虚实精彩纷呈。小说结构精巧，语言晓畅，文字幽默，看似自然随性，信手拈来，实乃饱含匠心，精雕细琢。作品所承载的理想至上、不忘初心的炽热情怀，充分展现了作家对国家、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感。也正是这份责任感，使得这部具有浓烈家国情怀的文学精品成色更为本真，主旨更为厚重。

情怀如辉映千春

□郭学锋

在浩瀚广袤的艺术星空中，唐诗犹如一颗耀眼的星辰，数千年来一直清辉不减，照耀心灵。人文情怀让唐诗焕发着蓬勃生机和磅礴力量，持久而深沉地展现着它的魅力，丰富着它的内涵，滋润着它的生命。

唐诗蕴含的人文情怀在描写请缨出征、精忠报国、建立功勋的诗篇中俯首可拾。“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魏征在《述怀》诗中展现了将士们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报国情怀。李希仲《杂曲歌辞·蓟门行》“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表达了诗人忠贞为国、以身许国的情怀。岑参的“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表达了作者勉励李氏万里击胡，立功扬名，创造英雄业绩，报效国家的热切期盼。

唐诗蕴含的人文情怀在刻画思念朋友、闺妇思夫、把酒言欢的佳篇里随处可见。李白写下“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将自己的愁心寄予明月，映衬着作者对王昌龄遭遇的深刻忧虑和深切思念。“披衣更向门前望，不忿朝来鹊喜声。”李端的《闺情》不仅是对一只鸟儿的恼恨，更凝聚着闺中少妇对丈夫的痴情、多年来独守空房的痛苦以及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无望哀叹。王昌龄《闺怨》诗中“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表达的是闺中少妇凝妆上楼，忽见陌头杨柳，联想起千里相隔的夫婿和当年的折柳赠别，让她后悔丈夫戍边封侯的愁苦情怀。孟浩然“壶酒朋情洽，琴歌野兴闲”，记述和友人饮酒酣歌、逸兴遄飞的心情；杜甫“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描写邀请邻居把酒言欢，唱叙心情。

唐诗蕴含的人文情怀在表现敬仰英雄、鞭挞现实、归隐避世的诗作中开卷可读。“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诗人李白在圯桥凭吊张良，对英雄豪迈之风钦佩不已，阐发了对张良逝去，徐泗两州萧条败落的惆怅。常建在《题破山寺后禅院》诗中写道：“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山光让鸟儿怡然自得，潭影让人心灵净化，钟磬之音让万物静谧，展现了作者寄托隐逸情怀的生活态度。“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杜甫《石壕吏》表达了诗人对朝廷穷兵黩武，大肆征兵行为的痛斥，以及对百姓深受征兵之苦的同情。

唐诗蕴含的人文情怀在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诗篇中随手可及。“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诗人王维通过询问寒梅是否开放，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思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千古流传的诗歌表现了诗人孟浩然内心的喜悦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杜审言在《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诗中写道：“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通过比较故乡中原物候来写异乡江南的新奇，在江南仲春风光里有着诗人怀念中原故土的浓浓乡情。

唐诗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昭示了一个真理：艺术唯具人文情怀，其生命才能博大而灿烂。伟大的艺术作品始终彰显着善良情怀，永远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世事的变迁而淡化疏远人类的情感。

一曲民族精神的颂歌 ——评民族歌剧《雁翎队》

□王书生

近日，大型原创民族歌剧《雁翎队》在河北艺术中心与观众见面，引发了笔者对白洋淀如诗如画美景的向往，以及对雁翎队英雄传奇的景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赞美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文学作品风行。《雁翎队》《沙家浜》《红灯记》等连环画成为孩子们的掌中宝。少年时期阅读过的经典故事，观看过的经典电影、戏剧，大都在脑海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如今重温，仿佛看到稚嫩的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作家卡尔维诺说：“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应有一段时间用于重新发现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的作品。”同一部作品，因阅历变得不同，获得的感受也就不一样。尽管对情节、人物描写，也会有不尽如人意的长吁短叹，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雁翎队战士的崇敬。何以至此？因为除了故事本身，真正让我们终身受用的是故事中蕴藏的深层内涵。

巧端敌人岗楼、截获敌人军火物资、为民锄奸、伏击敌人的包运船……抗日战争时期，在淀泊相连、苇壕纵横的白洋淀上，有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令百姓欢欣鼓舞的队伍——“水上飞将军”雁翎队。民族歌剧《雁翎队》反映的就是白洋淀雁翎队的战斗故事，部分情节取材于袁静、孔厥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鱼儿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战斗了。雁儿雁儿，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去把敌杀……”低沉婉转的合唱声中，如诗如画的白洋淀水面，伴随着入心入情的现场交响乐，拉开歌剧的序幕。高亢嘹亮的唱腔彰显着雁翎队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点燃现场观众的激情，引领大家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雁翎队》以有形表现无形，以有限表现无限。没有过多展现刀光剑影的激烈打斗，但战斗场景已全然浮现在观众眼前，实境与它所暗示的虚境融为一体。

红色经典承载着重现革命史实、弘扬革命精神的使命，也引导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深思。重映红色经典电影，重排红色经典剧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缅怀、纪念和致敬，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只有对历史抱有敬畏与感恩之心，才能不忘初心，更好地传承往昔的辉煌；只有铭记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才能勇担使命，迎来民族复兴的荣光。歌剧《雁翎队》，唱出了一个民族时代的记忆，唱响了一曲民族精神的颂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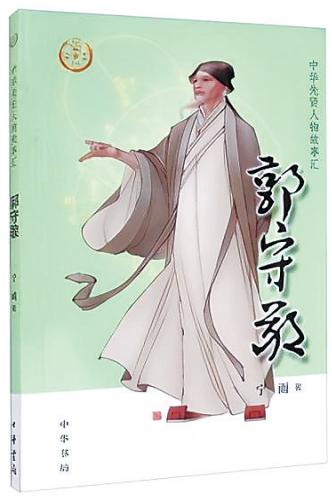
『实』与『虚』『人』与『事』 ——评宁雨《郭守敬》

□王力平

郭守敬是元朝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工程专家，他的毕生成就可以用“经天纬地”来描述。“经天”是他在天文、历法领域的卓越建树；“纬地”是他在水利工程、农田灌溉、水运交通方面的巨大贡献。宁雨《郭守敬》(中华书局2020年9月出版)是“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丛书之一，她会怎样讲述这个先贤故事？为了便于考察，我想设立两个观测点。

一是故事里的“实”与“虚”。

讲故事并不难，但讲述一个先贤故事是有难度的。这是因为讲故事可以通过虚构和想象，让故事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令人回味，而讲述先贤故事则受到史实的约束，要恪守真实，拒绝虚构。



道理并不深奥，但做起来却不容易，难在“分寸”二字。

宁雨讲郭守敬的故事，是从郭守敬九岁的一天开始的：“这天晌午，小守敬跟着爷爷郭荣到村外巡河。”这是《郭守敬》的开篇第一句话，立刻就把读者带进一个具体的情境之中，是深谙“讲故事”门径的笔法。祖孙俩一边顺着河堤走走停停，一边聊着“大旱不过六月二十四”的谚语。“忽然，嘚嘚嘚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守敬愣了一下神，而后迅速抻着爷爷的衣袖闪进路旁的庄稼地。”从听到马蹄声，到藏进路旁的庄稼地，这个细节相信纯属虚构，于史无据。不过，考虑到非虚构写作“大处不虚，小处不拘”的原则，这个虚构的细节描写是可以允许的。

其实，不只是可以允许，在我看来，恰恰是匠心独具。作者接下来写道：“‘听闻马蹄声，不是闹匪就是过兵。’这郭村所在的邢州地界，几十年来兵荒马乱已经成为常态。”如果没有这个虚构的细节，祖孙俩的这个晌午，就是一派天伦之乐、一片田园之趣。而事实是，郭守敬的童年，恰逢金末元初的乱世。一个虚构的细节，画出的却是真实的乱世景象。

当宁雨提笔讲述郭守敬的故事时，如果满足于就天文说天文，就水利说水利，单纯、孤立地罗列郭守敬的科学和工程技术成就，看似写实，实则大谬。事实上，她始终把郭守敬的科学技术成就，放在元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民生的宏大背景下去分析和讲述。在讲述“大都水官”时，作者借刘秉忠的奏对说出了开玉泉水以通漕运对于北方战事的重要性，为保证战事所用粮饷，先得把华北地区的粮食运至燕京，关键是设法实现通州至燕京通航。在讲述“授时于民”时，作者这样阐释了“时”与“民”的关系：“战争即将结束，和平的光亮漫向每一寸土地。不仅农人要依时而种、依时而收，分工越来越细致的五行八作，交通、驿馆、军队、朝廷，无不需要年月日以至更精确的时刻安排。”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也正是这个规律性，一再向世人表明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写出郭守敬的科学建树与元朝政治、经济、军事、民生之间的深刻联系，是宁雨的《郭守敬》值得称道的亮点。

二是故事里的“人”与“事”。

讲故事当然离不开“记事”。写郭守敬的故事，首先要把郭守敬一生成就的功业，一桩桩、一件件说清楚。比如邢州修桥、西夏治水、奉旨修历、营造大都水系，等等。但我比较欣赏的，是在明白晓畅的“记事”之外，宁雨还在“写人”上下了一番功夫。

《郭守敬》“写人”和“记事”是浑然一体的，差异只在于落笔着墨的角度。同一件事，从“做什么”的角度看，是“记事”；从“怎么做”的角度看，便是“写人”。作者不仅在“做什么”的问题上留意，同时也在“怎么做”的问题上用心。比如，“西夏治水”是郭守敬做的一件大事，而深入考察研究整个事件过程中郭守敬的行为方式、做事方法，层次分明地写他亲临古黄河灌区做田野调查；考察结束后，在待命的间隙，便着手设计恢复古灌区的蓝图；在意见不一时，坚持“因旧谋新，更立闸堰”的总体思路；开工后，像河工一样吃住在工地上；实行工钱日清日结，以激发河工干劲……这就是把笔墨集中到郭守敬是怎么做成了这件事的角度，这便是“写人”。

宁雨“写人”的功夫，还表现为把人物自然而然地放到一个经过精心选择的价值系统中去，通过精神归属和价值认同，达到刻画人物的目的。在“奉命修历”一节中，作者写郭守敬来到司天台，看到两百年前的浑仪，“他抚摸一个个零件，满心里充溢着对前辈天文学家的崇敬之情……他感觉每一个铜质的环，都有生命，会呼吸，甚至在跟自己交谈。”一个抚摸浑仪的动作，引出一段心理描写，完成了郭守敬与前辈天文学家及其治学传统的精神归属和价值认同。动作、表情和心理活动，并不是人物后续动作行为的动机，不是情节链条中的一环，不是在“记事”上留意，而是在“写人”上用心。这种精神归属和价值认同，构成了宁雨笔下郭守敬人物塑造的心灵内涵。

宁雨怀着对先贤敬仰而温暖的感情，一步步走近郭守敬。在走近人物的过程中，作者始终保持着自觉的主体意识和当代作家应有的历史视角，潜入史料的深海而不迷失自我，从而发现历史的深邃与幽暗、纷乱与丰饶，进而更深刻地理解了人物的辉煌与寂寥。